

世界文化丛书

A SERIES OF
THE CULTURES OF THE WORLD



麝香之路上的
西藏宗教文化

常霞青

麝香之路上的 西藏宗教文化

常霞青

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胡学彦
装帧设计 池长尧

麝香之路上的西藏宗教文化

常霞青 著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25 插页4 字数224 000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600

ISBN 7-213-00167-1/G·30

统一书号：7103·1374

定 价：3.30 元

《世界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编：周谷城 田汝康

编委：庄锡昌（常务） 金重远 庞卓恒 迟 轲

祝 明 朱威烈 顾晓鸣 顾云深 马小鹤

孙志民 张宪章

《世界文化丛书》序

周谷城

今天我们立足于祖国的现代化，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不难看出：现在世界各国彼此之间的关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正日益趋于紧密，各国家或各地区之间的往来日益方便；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关系日趋紧密，几乎成了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但要使这些关系发展得很好，甚至很合乎我们的理想，则研究、考察、寻找正确方向或理想前途的工夫，为不可少。着眼于文化方面的关系，组织学者、专家研究世界文化，出版世界文化丛书，已成了我们当前的迫切要求。

研究世界文化，先定出题目，请学者进行研究，写成专书，是可能的。学者自己先有研究计划，甚至已有研究成果，拿出来寻找适当的题目，更是可能的。我们组稿工作的进行，大体不外这些方式。每一本书所涉及的地区、时间、文化内容都不加限制，是可以的，如“世界文化史”即属此类，估计这类著作不会很多。与此相反，每一本书所涉及的地区、时间、文化内容都加以限制，也是可以的，如“欧洲中世纪的教会研究”即属此类；估计这样有限制的著作，一定相当多。介于这两极端之间，有的著作只在地区、时间上有所限制，如“中国

先秦文化”或“美国现代文化”即是实例。有的甚至只在地区上有限制，如“印度文化”或“拜占庭文化”即是实例。此外研究文化的方法或理论，如“文化与时间”或“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等都是实例。范围这样无定，体例这样不齐，只是由于世界文化从来就是不断发展的。到今天更是日新月异，不易把范围体例固定下来。不过，不把范围体例固定下来，反而使学者、专家易于着笔或易于发挥各人的独创性。

至于文化发展的方向或理想的前途，则不能忽视。发展的方向或理想的前途是不易明确的。这就要诉诸比较研究，即使诉诸比较研究，如果只拿现在与过去比，或拿中国与外国比，充其量只能了解文化的大势；必须进一步有具体细致的比较，才能把方向找出来。分别举例，如手工生产与机器生产相比，则知手工生产为落后，机器生产是进步的，于是反对落后、追求进步成了我们的方向。又如宗教迷信与科学真理相比，则知宗教迷信为落后，科学真理是进步的，于是反对迷信、追求真理成了我们的方向。又如压迫和剥削，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事情；拿压迫剥削与平等互利相比，则知前者为可恨，后者是可贵的，于是反对压迫剥削、追求平等互利成了我们的方向。方向不能忽视，比较研究则大有助于方向的阐明。研究世界文化的学者、专家未必完全没有涉及过比较；把研究的对象完全孤立起来，不顾上下古今，不顾前后左右，是不可能的，今天谈比较，不过希望把比较的范围扩大再扩大，力求使比较的对象具体更具体。果能如是，则研究文化的方向或追求理想的前途决不会落空。余不多谈，即以此为序。

1986年10月6日写于北京

前 言

无论给予“文化”以何种定义，它总是同人类求生存、求自身之延续和精神需要而相互“共生”。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文化可说是人类追求生存的产物，尽管它的表现形式从“符号”，直至“心有灵犀一点通”，乃至幻想的“彼岸世界”，涉及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但是，在它包罗万象的内容中，总离不开创造它的主体——人类。人类也正因为它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差异，而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群体。麝香之路上的西藏宗教文化——藏族的宗教文化，就是这些文化群体中带有雪山之乡色彩的十分耐人寻味的一朵奇葩。

由于人们对西藏不了解，因此对古代西藏的宗教同文化之关系往往处于一种机械的、“静态”的认识。同时，长期以来，斯大林的“民族学”理论依然在民族学的研究中起着不小的影响，从而把宗教、宗教文化对于藏族形成的重要纽带作用当成了回避惟恐不及的内容，不敢涉及。

从历史上看，藏族的先民同中原的一些民族，如羌族，早就有着血缘关系。由这种血缘关系所传播的一系列文化内容，经过宗教的作用，使西藏同内地的关系变得日益融洽。元帝国建立以后，西藏正式成为我国版图的一部分，这是历史发展的

逻辑结果。不过，这种历史现象，也为研究中国历史者从一个侧面提出了一个必须注意的视野：即中国的历史是中国56个民族发展历史的组合，是各民族间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决不能将汉族的历史同中国的历史等同起来。因此，现在所述的“东西文化交流”这一类问题，不能仅仅看成只是汉族同西方文化交流，实际上它也应该包括其他民族同西方文化交流这样的内容。

事实上，在很古以前，西藏同印度、克什米尔、贵霜帝国，甚至同波斯帝国都有往来。虽然，这些往来一般仅限于商业和宗教上的活动，但是它却给西藏的文化带来很大的影响。

毋庸置疑，西藏的地理状况是相当独特的，特别是念青唐古拉山以北地区，至今仍是十分荒僻之地，被人们视为险途。人类要在这些地区生存、延续，其文化充满了种种神秘色彩。对这些神秘的文化进行深入的考察和分析，将会使我们对那里的种种文化现象了解得更彻底些。

目前，往往将宗教学放在哲学这一部类下，而哲学也是广义的“文化”的一个部分。但是从研究的角度来讲，文化研究的对象同哲学研究的对象还是有所区别的，前者主要着重于对形式和内容的探讨，而后者主要追索实质。鉴于这个区别，本书的写作自然就需更多的资料来点出主题，这就让我们溯西藏文化之激流而上，看一看在它汇成独特的文化巨流时其前期文化的主要形态。

本书共分7章。由于笔者才疏学浅，因此本书肯定有很多谬误，望各位尊敬的老师、学长予以指正。

目 录

《世界文化丛书》序 周谷城

前言 1

第一章 世界之巅的古文化拾遗 1

神话和传说 1

藏族主体文化——青藏高原民族
的凝聚力 12

新的启示——文化与民族 27

第二章 象雄之谜 30

象雄的时间和空间 30

象雄和本教 39

象雄文字和语言 48

象雄之谜 58

第三章 本教在藏文化深层结构中的沉淀 63

卅、九、十三和本教的婚姻仪式 64

佛本的融合，“伏藏”发现和本
教经典 73

本教的诸神和仪式 87

第四章 佛教文化的传入和发展 97

灭佛与兴佛 98

西藏佛教的后弘期和阿底峡 109

第五章 藏传佛教和它的教派 123

具有浓厚本教文化色彩的宁玛派 124

萨迦派及其变化 130

与阿底峡有渊源的噶当派 138

称为“白教”的噶举派 143

宗喀巴的宗教改革和格鲁派在西
藏的统治地位 159

藏传佛教其他教派 170

佛教著作的翻译和整理 174

第六章 东西交融的途径 191

张骞的设想和现实 193

第四条东西文化交流之路 202

世界历史中的吐蕃 216

第七章 内向的西藏文化 227

民族的锁链 228

安多方言、藏王墓和藏文化 241

揭开神秘的纱幕 250

附录 255

参考书目 312

后记 319

第一章 世界之巅的古文化拾遗

当你在追溯雅鲁藏布江的源头时，可曾想过西藏文化之源头何在？最近在西藏、青海、四川西部的一些地区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许多处古人类遗址，其文化年代已由考古工作者给予鉴定。但是，这些考古资料只能说明这样一个问题：西藏自古就有人类居住！

这些古人同藏族究竟是什么关系？藏族究竟是怎样形成的？都需要进一步加以探讨。因为“民族”的概念既不能从血缘上加以区分，也不能用“地域”来划分，它是一种特定的文化概念。这是在研究藏族问题上必须掌握的关键。

当我们将大部分工作留给考古工作者来说明时，神话和传说自然就成了我们研究西藏文化所必不可少的应拾之“遗”了。不过，在谈西藏民族族源神话和传说之前，必须说明“猕猴祖先”之说同“从猿到人”的进化论观点毫无联系之处，也就是说本章的“拾遗”，并非有“遗”就拾。

神 话 和 传 说

关于藏族的起源，历来有很多神话和传说。据熏奴贝的《青史》记载：“协饶果恰（智铠）师说西藏地区和人类等

也和印度相同，如果作为从住劫而有，这样于教于理都无过失。而且导师释迦牟尼未出世以前，争劫最初时间中，嘉色五子歼灭十八支军团或说十二支军团时，汝巴底王和一支军团交战失败，伪着妇女装而逃到雪山丛中居住，而发展出的种族，即现今所称的西藏。”往昔诸古书中说：“此土古名布嘉，后来说名为藏”。这一说法也和协饶果恰所说相合；特别是释迦牟尼住世时，名为藏也是《分辩教》（广戒经）中所说。《时轮密续》中也有圣地名藏等的说法。至于栗赤赞波虽与大释迦、惹遮巴释迦、毗耶离释迦三种族姓中，任何一种都有所不同。然而在《文殊根本续》中，从松赞王至朗达玛以上，都有极明显的记载（预言），其示（藏王）阶段中《文殊根本续》中说：“是‘毗耶离种中所出’。以此正应说是‘毗耶离’种姓。”熏奴贝赞同协饶果恰的说法，并以此为证据，认为藏族来源于印度的毗耶离释迦族种姓。除《青史》外，《布顿佛教史》、《西藏王统记》、《西藏王臣记》、《红史》、《新红史》、《蒙古源流》等一些史书上都有类似的看法。这些书的成书年代均在佛教传入西藏以后，书的作者都是西藏佛教界的上层著名学者，因此，他们的作品显然带有浓厚的佛教色彩，将族源同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攀上亲缘关系，一方面，给藏族和西藏这片土地置于神秘的地位；另一方面，也使佛教能够在西藏顺利传播。这种说法，已为近年来西藏地区的考古资料证明是毫无根据的、非科学的。从文化融合的角度来看，藏族的文化，受到印度佛教文化很大的影响，则是事实，然而这与藏族的起源问题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在《敦煌古藏文文书》中，有“藏族先祖出自十三天的天神”的记载。这个传说与本教在西藏流传有关。天是西藏本教

崇拜的三界之上界，把藏族祖先说成是来自天界之神的后裔，这样不仅显得本教历史源远流长，而且也有利于巩固本教在西藏的地位。作者的用心是显而易见的。而在《贤者喜宴》一书则认为：“天神是受观世音的加持，自第十三级天——色界光明天，以慈悲下人世，成为人主。”这一段传说与《敦煌古藏文文书》上的记载颇为相似，只是增加了佛教的内容，成为一段具有佛教色彩的本教古老传说。虽然它不能说明藏族的起源，但是却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佛教与本教的融合。

也有人认为藏族与马来人种相近，因此误以为是由马来半岛迁移来的。也有因藏语属缅藏语系而推论出藏族源于缅甸。我们并不否认古时西藏与这些地区可能有过一些交往，但是，文化上的相互影响，并不能说明一个民族的起源问题。近年来西藏地区的考古发现证明自远古以来，西藏地区就有人类居住。因此，这些“外来说”已成为无稽之谈。

关于藏族起源于羌族的说法，在许多历史书上都有记载。据《新唐书·吐蕃传》载：“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鹵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诸羌，据其地。蕃、发声近，故其子孙曰吐蕃，而姓勃罕野。”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古代羌人活动的地域范围很广，“羌”可能是当时许多氏族的“共同体”，活动在西南的广大地区。至于“祖曰鹵提勃悉野……子孙曰吐蕃”的说法，在《敦煌古藏文文书》里以及一些吐蕃时期的盟碑里确有“鹵提悉勃野”的称呼，但多见于唐代的记载。但是，“鹵提悉勃野”是否就指羌人，还值得怀疑，仅据此认为藏族即“羌”，是缺乏根据的。黄奋生先生在他的《藏族史略》一书中，引用了大量的有关古

代羌族的资料，认为藏族起源于羌人，“康、藏两地迄今未发现地下史前文化遗物，不能说明藏族起源于康、藏。……由于上述新石器文化与羌人的历史传统记载相印证，羌、藏古今语言及生活习俗相结合，我们暂可得出如下的结论：羌人是甘、青的土著种族，羌人是藏族的前身，藏族起源于甘、青。”他还认为：“《新唐书》称：‘吐蕃本西羌属’，《宋史》称‘吐蕃本汉西羌之地’，明《一统志》称：‘西番即吐蕃也，其先本羌属’。历代史学家的这些看法，也说明了羌、藏是一个民族。”笔者认为，在古代西藏高原上有羌人的活动，根据史料分析，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就此下结论，说藏族来源于羌，未免过于简单。如果说藏族中的一部分来源于羌，则是合乎情理的。因为“民族”是个广义的“文化”概念。正象“汉族”不仅包括“华夏族”还有其他民族一样，羌人自然也不能概括藏族这个概念。

虽然有人认为“卡诺”文化遗址只能代表古代西藏东部地区的文化状况。但是，根据近年来在唐古拉山脉以南至喜马拉雅山脉以北的广阔区域内发现的旧石器文化遗存，以及在西藏林芝县、墨脱县、拉萨市北郊曲贡村，山南乃东县等地出土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以及这些遗址“点”的集合，可以证明在西藏高原的很多地区自古就有古人类生存，至少在五万年前藏族的祖先们就已经繁衍生息在这片土地上。

西藏流传着不少关于藏族起源的传说。在这些传说中，最为脍炙人口的是关于“猕猴变人”的美丽的神话。据索南坚赞的《西藏王统记》所载：从前有一只受观世音菩萨点化的神猴到西域雪国去修法，“此猕猴乃至一岩洞中潜修慈悲菩提心，并于甚深妙法空性，生起胜解。于是有一业力所逼之岩罗刹女至

彼处，诱以淫欲。此罗刹更化一女人，语猕猴曰：‘我二可成婚媾。’猕猴答曰：‘我乃圣观音之具戒弟子，如为汝夫，破我戒行矣。’魔云：‘汝不娶我，我即自戕。’”猕猴无法，只得去求教观音菩萨，在征得观音许可后，便与岩罗刹结为夫妻，生六雏猴，把他们送到森林中果实多的地方，历时三年，增至五百，果实吃尽。父猴又去观音处讨教，观音“自须猕山隙，取青稞、小麦、豆类、荞麦、大麦，播之于地，大地满生不种自收之谷。父猴乃引群雏至地，以不种自收之谷付之。命之曰：‘其食此！’以故名此地梭当巩保山（意为命令取食山）。于是饱食诸谷，毛尾转短，能作言语，遂变成人。食不种谷，着树叶衣，如是雪国主人，因猕猴父与女魔而分二类。……”这段神话故事在西藏民间流传甚为广泛，许多史书上也有相类似的记载。虽然这是一段早期的神话故事，但是，从中可以看出古代藏族先民的生活片断。因为，在我们接触到的各个民族中，都具有这种生动、脍炙人口的神话，如果去掉“神”的色彩，实际上反映了当时人类生活的部分面貌，是原始思维的产物，因此，是我们研究史前西藏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

对于这段神话的内涵以及它与藏族的起源是否真有什么联系，历来有一些不同的见解。在对神话进行分析时，必须有一个前提，即我们不能用现代科学来证明神话所反映的故事的真实性，而只能用现代科学来分析神话产生的原因。在一篇谈藏族神话“猕猴变人”的文章中，作者认为：“说‘藏族祖先是猕猴’的神话是古代藏人对生命本身的科学认识是缺乏佐证的。”但是，在文章的后面作者又认为：“毋庸置疑，做为今人的我们设想一下远古藏人的生活就可以知道，在雅砻河谷中的藏族先民无非是从那些在森林中采野果为食、撷树叶为衣，

群居乱婚的猕猴身上，在那些与自己形态完全一样，只是不会言语的动物身上，看到了自己过去的影子——联想就这样产生，继而有了神圣的叙述。……神话‘猕猴变人’……，它是藏族先民天才的切实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创作’，因为它弥合于科学，至少可以说：雪域的主人想得真妙，他们在远古便神奇地想象到了人是由猕猴变来。”

关于这段神话产生的确切年代，我们现在还不清楚，但是从内容来看，显然是人类原始思维的作品。当时还处于人与动物区别不清的阶段。也即是它只能产生于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新石器时代，或者更早一些的蒙昧时代。处在这种状况下的原始人根本不可能对生命起源有科学认识的。那么，他们怎么把动物和“自己的过去”联系起来，也就是说，这种“联想”是在什么基础上产生的呢？这位作者认为是这些藏族先民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存在着进化论的观念。根据这种“超越时空”的理论，就使藏族族源神话的产生落进了这样一个模式，即：原始时代就有了“进化论”观念——由“进化论”观念产生了族源的联想——美丽神话的产生。按照这样的观点，得出的结论是：神话是以科学为基础的，它不是原始思维的产物，这显然是违反人类思维发展过程的。神话是人类童年时代的产物，是人类原始思维的作品。特别是有关人类起源的神话，更是原始社会早期人们的原始思维的形象记录。在《雍仲本教史》一书中，有关于藏族起源于“六个黄色发光之卵”的记载，也属于这一类。同样，在世界上大部分民族的族源神话中，也都有类似的例子。如在北美的印地安人中流传着人类起源于野狼的神话；在埃及，流传着人与神鹰交配繁衍后代的神话；我国独龙族中人传说最初的人是由一棵树变成的；在蒙古族中，人们传

说狼与鹿交配共生了人类，等等。这些神话都以形象化的方式描绘了本民族（或氏族）的起源。这些内容自然是非科学的，我们决不能从卵、从狼与鹿、鹰、树中去探究人类的起源，这些神话只是反映了生活在不同地区的这些原始初民生产力状况和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的文化形态而已。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猕猴变人”貌似今天“猿猴变人”的科学结论，而就对这一则神话作特殊处理，把十八世纪以后才产生的进化论强加在几千年之前的原始人头脑里。

人们开始探讨人类生命的起源，是在科学有了很大发展的时代。直到今天，我们尚在思考这个问题。对于原始人来说，不可能专门去探讨人类生命的起源问题，他们更多的是考虑谋求生存的手段。他们把自己的氏族说成是某一具有神性的动物或植物的后代，其目的是为了得到这些在原始人看来比人类具有更高本领的、神性的动物（植物）的保佑。一旦当生产力提高，人开始意识到自己比动物优越得多的时候，这种动物与人的颠倒，就会重新被颠倒过来，人崇拜动物的时代也就过去了。因此，当我们认为处于蒙昧时期的原始人也在探讨人类生命的起源时，实际上已经犯了一个错误，即把几千年前，甚至更早时期的原始人当作是已经具有了现代人意识的人，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因此，把“猕猴变人”的神话同藏族起源问题牵扯在一起，完全是一种牵强附会的、非科学的解释。

不过，“猕猴变人”的神话的产生并非无因，它反映了当时藏族先民所生活的那个时代风貌，这一切我们从西藏的考古资料中可得到印证。1978年，在西藏昌都地区发掘的“卡诺”文化遗址，是目前所知道的西藏最早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据 C_{14} 测定，其绝对年代距今4000年以上。遗址总面积为